

生态经济评论

ShengTai JingJi PingLun

(第五辑)

主编 洪名勇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办

贵州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贵州省生态文化研究会协办

生态经济评论

(第五辑)

主 编 洪名勇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经济评论. 第5辑/洪名勇主编. —北京: 经济
科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41-5897-7

I. ①生… II. ①洪… III. ①生态经济-文集
IV. ①F06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8330 号

责任编辑: 王长廷 袁 激

责任校对: 郑淑艳

责任印制: 邱 天

生态经济评论 (第五辑)

主编 洪名勇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装

787×1092 16 开 17 印张 330000 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5897-7 定价: 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王红蕾

主 编：洪名勇

副 主 编：何腾兵

卷首语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态经济评论（第五辑）》如期面世。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改革大趋势下，在贵阳市连续主办5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并成功举办首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本土实践基础上，中心正式启动与贵州省生态文明研究会的全方位合作，2013年年底科技部、教育部批准成立贵州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2014年年初贵州大学决定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合署办公，因此，研究会和研究院成为协办单位。今后，我们将更加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三农”问题，更加关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本土经验与实践，不断扩大影响。

在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下，《生态经济评论（第五辑）》聚焦生态理论与生态经济研究、农村建设与“三农”研究、区域发展路径研究、农村社区管理研究四个领域。

“生态理论与生态经济研究”采用5篇论文，罗涛博士后介绍了中国近代以来“自然”这一观念的引入及中国社会中生态环境观念的文化根源，并分析了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态、环境、自然观念重新形成的作用和影响；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静研究员认为处于后发赶超中的贵州，面对既要发展又要保护的壓力，面对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使命，借全球智慧、借改革发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关键是要还原生态经济本质，夯实生态文明基础；马静博士则探讨了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制约因素问题；洪霓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制造业结构与雾霾治理的关系，指出累积效应、移动效应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但更深层原因则是制造业结构低级化（结构效应），提出治理雾霾必须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入手；陈光军副教授对石棉县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进行了系统探索。

“农村建设与‘三农’研究”采用5篇论文。卯丹以“中国村落里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闽南赤石村的个案研究”为题，对中国村落中村民自治组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运行现状的人类学个案进行研究，试图以闽南赤石村新农村建设理事

会为例,勾勒出当今中国农村公共空间运作的一种具体表达形式,且其运作过程是与村委会行政关系、村落里的宗族力量等交织在一起的。赤石村理事会的实践证明,在处理村落公共事务方面,村落理事会的村落自治模式较村民小组长式的管理方式更为有效,或可成为中国村落社会建设模式的有效借鉴例子;邢成举博士基于成都市石村增减挂钩项目调查探讨了增减挂钩、统筹城乡与农村城市化的关系;袁明宝讨论了“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认为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韩飞以贵州省桑村的实践为例探讨了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运行与社会后果,提出相关的政策思考;杨瑞玲等以“基于3G的基层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为例,探讨了信息化在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中的应用及效果,表明信息化有利于农技推广人员的能力建设,有利于拓展推广业务服务范围,促进农技推广体系实现有效组织管理和农民实现自助农技服务,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革新和完善提供借鉴。

“区域发展路径研究”采用6篇论文。洪名勇教授等从贵州农业发展的背景和发展现代山地高效农业的紧迫性,探讨了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谢静等从技术集成的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农业清洁生产所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体系,以及集成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对促进农业清洁生产的作用及意义,提出集成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对策与建议;党华美等总结国内外的农业污染物综合防治状况,指出贵州省要实现清洁生产,产前要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和责任体系、建立农业污染防治的财政与市场补偿机制、积极组织农民进行农业污染防治培训,产中要加强农业污染的监测体系,产后要加强末端管理,完善综合防治体系,保障农业的清洁生产;熊德斌教授基于农业发展中不协调视角分析了贵州山地农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动力;盛伟应用GIS和Geoda空间统计软件分析了西藏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晏小燕从经济社会指标深入分析了西藏边境县贫困的现状及减贫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了资源资本化的对策思路。

“农村社区管理研究”采用了5篇文章。伍国勇对近年来关于农村危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分类和讨论,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方向;安利以贵阳市花溪区为例,分析了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行为;苏卫全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发现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具有积极意义,提出一种新的重构社区的思路和方法;郭卫红、邓永祥以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农民工子女的就读现状为个案,分析探讨了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的学校责任,并提出了应对措施;王丰分析了我国当前农业投资所面临的机遇和困局,针对投资领域选择、商业模式定位、投机心态克服三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策略。

周思宇博士在本辑组稿和初审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生态理论与生态经济	1
自然观念的西方流变及其中国文化根源	罗 涛 3
还原生态经济本质 夯实生态文明基础	徐 静 19
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制约因素	
——以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例	马 静 23
制造业结构与雾霾治理	洪 霓 33
石棉县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陈光军 46
农村建设与“三农”研究	61
中国村落里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闽南赤石村的个案研究	卯 丹 63
增减挂钩 统筹城乡与农村城市化的实践	
——基于成都市石村增减挂钩项目调查	邢成举 80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袁明宝 9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运行与社会后果	
——基于贵州省桑村的实践	韩 飞 100
信息化在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中的应用及效果	
——以“基于 3G 的基层农技推广信息化	
平台”为例	杨瑞玲 周圣坤 左 停 116
区域发展路径研究	129
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背景与紧迫性	洪名勇 张梦珮 朱玉鹏 131
集成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促进农业	
清洁生产	谢 静 党华美 何腾兵 159
农业生产污染防治技术体系探讨	党华美 谢 静 何腾兵 175
贵州山地农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动力思考	
——基于农业发展中不协调视角分析	熊德斌 洪名勇 181
基于 Geoda - GIS 的西藏自治区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盛 伟 187

西藏边境县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	晏小燕 197
农村社区管理研究	207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伍国勇 209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行为分析	
——以贵阳市花溪区为例	安 立 218
重构社区：以社会资本的名义	苏卫全 230
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的学校责任浅析	
——以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农民工子女的就读	
现状为个案	郭卫红 邓永祥 247
我国当前农业投资形势与策略分析	王 丰 256

生态理论与生态经济

自然观念的西方流变及其中国文化根源*

罗 涛**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中国近代以来“自然”这一观念的引入及中国社会中生态环境观念的文化根源，并分析了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态、环境、自然观念重新形成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回顾发现，对中国近代以来环境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自然观思潮主要有三个：作为客体的自然观、为了自然本身的自然观以及田园诗般的自然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潮中，也有三个主要的思潮影响并形塑着当代中国的自然观念，即天人感应观、佛家的慈悲观以及中心和边缘的权力。

【关键词】自然 文化 环境 观念史

一、释义“自然”

汉语中最初并没有存在过一个直接对应“nature”的词语，因为“nature”一词的欧洲历史非常复杂。严复在翻译达尔文（Darwin）的著作时，仍然使用“天”一词来指代达尔文的自然。20世纪20年代以来，自然已经成为西方词汇中“nature”类似意思单词的主导翻译。就像众多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术语一样，中国从日本翻译中引进了这一术语的新用法。1924年的日语字典把这一术语界定为：（1）“文明”、“文化”和“技能”的对立面；（2）实际存在物的总体，与“灵”和“历史”相对。（Dai Nihon Pyakka Jisho Benshoshu, 1924）这两个定义都让“自然”这一术语远离它的经典汉语含义“自然而然”，它现在首要的定义是作为文化的反义词。

现在任何一部现代字典都将告诉你汉语中对应英语“nature”一词的是自然。然而，这种简单的对应掩盖了这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的理解难度。威廉姆斯（Ray-

* 本文编译自魏乐博（Robert P. Weller）的著作《发现中的自然》（Discovering Nature）一书的第二、第三章，参见：Robert P. Weller,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作者简介：罗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自然生态与文化发展。

mond Williams, 1983) 把这个英文单词称为“可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词语”。汉字“自然”的译法在 20 世纪才被接受,并同时把英语单词“nature”(以及其他西方同义词)的历史复杂性叠加到对自然的本土理解之上。

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了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而进入汉语的许多词语不同,自然一词不是新造的,而是旧瓶装新酒。它的两个义项有“不言而喻”或“自发地”的意思,常见的组词形式是“自然而然”,意为“理所当然”(as a matter of course)。这与英文“nature”的某些从属意义相一致,当我们说某些事情“自然地”(naturally)发生了,“自然地”意味着自发地或者出于它的内在组成。然而,西方“nature”直接表示的许多义项“自然”一词并没有触及,例如:(1)事物的本质;(2)引导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力量;(3)物质世界本身(Raymond Williams, 1983)。尤其不能表达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

自然的概念也在随着时间而进化,但意义的变化并不大,而是增加了更多意义的层面。某种意义上,18 世纪——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在“自然”的义项进化中尤为重要,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时期之初发展得非常迅猛,但是二分中的自然一面的一种新的且更积极的进化最终获得了影响力(Maurice Bloch and Jean H. Bloch, 1980)。正如托马斯(Keith Thomas, 1983)总结自然一词在英国的变化时所说:

到了 1800 年,英国都铎时期自信的人类中心主义让位于一种总体上更加困惑的思想状态。世界可以不再被视作只为人类而创造,并且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严格界限变得越来越脆弱。……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人类是唯一神圣的物种。一些浪漫主义者更偏爱一种曾经被谴责的神秘主义观念,即“每一丛灌木都是神圣的,而且每一株杂草都是天赐的”。

自这一时期之前的一个世纪以来,事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时自然和文化的分离还非常明显。之前的和之后的观念都在欧洲和美国得以延续,并且这两者都将最终影响中国的自然观念。下面本文将简单回顾一些“自然”概念的主要思潮,这里无意于掌握它的全部复杂格局,而仅限于界定那些对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主题。

二、西方三种主要的自然观念

中国整个 20 世纪阶段,至少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三种关于环境的主要思潮影响:第一种是把自然首先看作是供人类利用的客体,第二种是把保护没有人类活动

的自然本身视为其首要目的，而第三种是把特殊的田园关系想象理念化，作为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病态的矫正。其中第一种思潮，披着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无比理想化的“赛先生”的外衣，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凌驾于其他外国思潮和更加有机的中国式观念之上的近乎支配性的权力，科学观完全掌控了教育系统和政策的建立过程。

然而，即便是这三种主要的“自然”思潮，也存在把人们带往不同方向的重要变体。例如，一个为了人类利益而存在的客体化的自然，怀着未来的科学将会解决引发的问题的希望，就可以简单地被开发。然而，相同的基本立场也能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不同的以自然为中心的观点也有不同的意义：浪漫主义的自然、缪尔的令人赞叹的美国荒野或现代的生物中心主义，它们都有重要的区别；田园主义也有许多的不同形式，下面我们来探究这些不同思潮的来龙去脉。

（一）作为客体的自然

在1967年出版的有影响力但仍富争议性的文章中，怀特（Lynn White, 1967）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环境理解，他将自然视作人类开发的工具。他写道：所有受造物，除了为人类服务的目标外，别无其他任何目标。并且，虽然人的肉身是用黏土做出来的，但他不单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是根据上帝的模样制造出来的。基督教是世界上见过的最以人类为中心的宗教，尤其在它的西方形式中……借着摧毁异教徒的万物有灵论，基督教使得以一种对于自然客体的感受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开发自然成为可能。

由于怀特把上帝从自然中移除，为两种观点开启了大门，一是快速的技术升级，一是生态开发。这些态度受犹太教影响，但是他指出，是基督教将它们传播到无处不至。当然，怀特认识到基督教是一个拥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复杂信仰，圣经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其他解释的进路。怀特5页纸的文章省略了2000年的变迁；如果我们把犹太教包括在内的话，省略的部分更多。它尤其淡化了一些中世纪观念的重要性，像象征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它看到上帝留在自然物中的信息）或存在巨链理论（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它将所有事物都置位于一个单独的神圣等级中）。

尽管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自然的这一客体化版本的潜在根源，但大致上直到启蒙运动之时，它仍未变成自然的支配观点。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在18世纪中，变成关于政治哲学争论的一个关键背景。首先是卢梭（Rousseau）的论述带来了对于自然的一种全新积极态度的开端，尽管霍布斯式（Hobbesian）关于自然生活的“肮脏、粗野而简短”的版本同时也保持着影响力。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虽然有些人喜欢这一划分的自然面而其他人喜欢其中的文化

面,但是所有人都接受了这种给定的划分。

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划分曾经如何广泛传播并具有影响力,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顾。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也曾经争论过,关于由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代表的“自然”生活的质量和价值。然而,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阶层很明确地决定站在工业和自然开发这一边。像默顿(Thomas Morton)这样沉默的人也曾经指出,按照卢梭缅怀过去的方式,这些土著居民过着一种丰裕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优于欧洲社会(William Cronon, 1983)。因此,马萨诸塞州法庭拒绝承认土著对于任何土地的权利,除了他们耕作过的小地块。

欧洲的民俗故事并非产生于清教徒传统,但他们还是倾向于把荒野看做是病态的。在我们童年如此多的故事中,危险和毁灭就潜伏在文明的围墙之外——彼得和狼(Peter and the Wolf)、小红帽与大灰狼(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d Her Wolf)、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 and Their Witch)、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Her Beast);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个故事清单一直续写下去。所有这些童话故事,我们拥有最早的文字版本来自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而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革命大致上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它进一步把作为主体的自由人类从作为客体的受规则约束的自然中分离出来(Bruno Latour, 1993)。

自然作为一个通过科学被理解并通过引擎来控制的机体的图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了巅峰。铁路笔直地随着它的线路劈开山峰,大坝堵塞住最难以驯服的河流,蒸汽船和电报冲破了交流的旧障碍。巴拿马运河分开了南北美洲,在某种意义上,它还破坏了北美洲大陆自身的缓慢漂移。自然变得完全不再幻想、没有精神,只躺在那里等待开发。

对于自然的最终控制的技术梦想,在进行到19世纪晚期的自信顶点时抵达中国。乾隆皇帝在18世纪对灵巧的欧洲钟表的消遣,变成了一种痛苦的认识——中国在19世纪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英国的军事优势自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变得明显,而此时已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开始认真努力试图在19世纪末实现其技术现代化。

(二) 为了自然本身 (Nature for Its Own Sake)

西方环境伦理的早期历史通常关注于人类对自然的文化和技术的支配观念的增长及最终胜利。然而,最近的著作显示这些伦理已经成为十足的过度单纯化的事物。生态科学自身部分产生于科学家们关于环境快速退化的关注,他们可以记录整个作为殖民主义经济变迁结果的世界(Richard H. Grove, 1995)。生态学不但比大部分其他科学更加年轻,而且它强调互动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因果论,这与其他学科也

有差别。

当然，科学之外的变体数量更多。乐观主义者看来不可避免的过程，即对自然的控制不断增强，招致来自浪漫主义者的批评。浪漫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思考者和作者，在18世纪晚期开始提供思考自然的替代方式。他们并未太多质疑从启蒙运动后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的自然和文化的分离，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转变了曾经置于这些概念之上的价值判断。在文化方面他们质疑进步和理性的正当性，并且捍卫了非常不同于启蒙观念的一种英雄的、情绪的和直觉的自我。在自然方面，为了荒野本身，为了那些荒野在其中具化了力量并将超越所有理性的思考方式，他们变得对荒野抱有深深的兴趣。

因而作为他们对于社会习俗的普遍质疑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者是把自然旅游带入原野的先锋者。阿尔卑斯山（Alps）——欧洲文明的内部边缘——成为一个为人们所钟爱的终点。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书讲述了这类主题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制造出怪物的错位的科学观，混合了恐怖的力量和单纯的贵族身份的反社会的怪物，以及在阿尔卑斯山上开展的戏剧性追捕。自然被再评估，部分回应了人类科学战胜自然这一叙事。这个自然既可怖又高贵，是一片适合于英雄的场地。它不再是清教徒的荒野，清教徒的荒野唯一恰当的用途就是用篱笆圈起来耕种。

毋宁说，这些观念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包括在阿尔卑斯的原野中这段重要旅程的游学之旅，最终变成了英国绅士核心的通过仪式。在美国，爱默生（Emerson），特别是梭罗（Thoreau）开始写作关于思考自然的新方式。梭罗在马萨诸塞州森林中的实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广泛批评，尽管它几乎很难被描述成一段荒野经历。梭罗可以很容易步行去见他在康科德（Concord）的朋友；他把在市场上购买的各类补给品记在账单上；他甚至描述了来瓦尔登湖采冰并通过附近铁路运输出去的工人的利益。与其说梭罗崇拜荒野，不如说他提供给我们一种不需要城市生活和社会习俗的矫揉造作，只是基于个体自身的简单性和纯洁性的生活方式。因此《瓦尔登湖》和他论公民不服从的其他作品相一致，也是规劝人们按照个体意识行动，而不管社会压力（Henry David Thoreau, 1986）。因此，这里是一种在荒野中的浪漫主义英雄性的自我共鸣，尽管这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图像，更适合于新英格兰地区而不是阿尔卑斯山脉。尽管梭罗并不简单是为了荒野本身而拥抱荒野，但它有助于打造一种非常不同的思考自然的方式。

然而在19世纪晚期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争论的延伸，即关于为了自然本身而限定人迹未至的自然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最伟大的发言人是缪尔（John Muir, 1901），他用世俗的语言写作，但令我们读起来像是宗教：独自坐在群山环抱之中内心极度欢喜，没有任何显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类曾经到过的痕迹。“只要是天然的自然

景观,就没有丑陋的。”他的著作最终帮助了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创立,并且形塑了的保护人迹未至的自然的内在哲学。

当然,这个目标在某些方面是个幻想。在大部分案例中,人迹未至的荒野只能通过把已经居住在上面的人们——通常是土著美洲人——迁移走的方式来实现。它忽略了这些方面,即使没有人居住的环境仍然经历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像酸雨、气候变迁、人类携带的外侵物种)。并且它还忽略了另一点,把土地作为公园来保护本身就影响了环境,例如通过游客交通设施或防火管理政策。因为这种观点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拥有很深的根源。像作为客体的自然(Nature-as-object)的观点,它假定了文化和自然之间明确的分离。像浪漫主义及其追随者,把一种强大的内在价值置于自然本身之上。至少在这一意义上——它坚持为了城市使用者的启发和愉悦而保存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对城市生活的批评。

这些不同的彼此相关却互异的对于自然的希冀的肯定,共享了自然/文化分离的西方传统,但却推翻了更普遍的价值,即只在荒野中看到邪恶并把自然视作为人类舒适的工具。当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论点遇上反增长的生物中心主义时,我们今天确实听到了这种分离的回响,争论双方都预设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一个极端只在文化的层面看待价值,把自然视为开发的客体——保存的目标只是为了确保未来的开发;另一个极端重视自然,有时在这一点上建议人类人口的急剧减少是重新获得适当平衡的唯一方式。

对为了自然本身的理解,并未像对于自然的科学理解那样早地进入中国。至少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帮助把自然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杠杆就是科学,尽管其他观念在欧洲和北美洲的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直到20世纪,中国才出现数量可观的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他们对欧洲和中国的传统都了如指掌。在欧洲或日本这些最影响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中,尽管缪尔和梭罗并不显得突出,但浪漫主义肯定是中国舶来原料的一部分。

李欧梵(Leo Ou-fan Lee, 1973)曾经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指出,他们的作品发展了两个主要的浪漫主义主题。第一个是关于感情和情绪的深度,往往带着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无助感。第二个和第一个主题存在某些张力,是英雄式的个体主义观念。然而,更不明显的是自然在欧洲浪漫主义之中这些主题的发展中承担的象征性角色。这些中国故事的英雄和作者过着现代城市生活并挣扎于爱和社会习俗之间。他们并未开启荒野的游学之旅,或在怪物和群山之间沉思。他们也没有像梭罗一样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像缪尔一样在人迹未至的荒野中热烈歌颂。城市仍然是他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核心。

（三）田园诗般的自然

即便在欧洲和美国，自然和文化并不总是处在明确的对立中。田园主义一直以来提供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在那里人类和自然生活在快乐的平衡中。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农民生活的田园风味观点是一种城市现象——农民自身几乎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机会持有过分乐观的观点。像荒野观念一样，把农村生活的叙述服务于对伴随着腐败和装腔作势的城市的逃离和批判。尽管田园主义和自然的荒野或浪漫主义观念不同，但它提供给我们一种人类满足的乏味景观。就像贝多芬（Beethoven）的第六（田园）交响曲一样，雷电可能打破田园的宁静，但太阳永远都会再次照耀大地。

田园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体裁的源头要回溯到罗马时期，但是它的传统风格的现代盛世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19世纪。尽管我们首先把这个术语用于艺术，但是它背后的观念也有重要的政治对应物，即期待一个正义而民享的国家可以建立在独立自由的自耕农的坚实基础之上。在18世纪晚期这曾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关于新美国人的民主如何运行的理想图景（Leo Marx, 2000）。到了19世纪晚期，世界的许多地区经历了经由西方的自由思考者推动，意在打破对各式各样的公社形式（从本地人控制的村落一级到教堂土地）的地权控制的土地革命。他们曾经希望并假定小农的国家将会既更有生产力，又更加民主。这些大部分发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的实际结果远不那么称心如意，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Joel S. Migdal, 1982）。

作为文学传统的田园主义在19世纪逐渐消失，而杰斐逊式的小农社会的希望从那时起对于美国或西欧来说变得全然没有可能。但是感谢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回顾起过去农民想象中的纯洁性和简单性，田园主义又一次获得新生。肇始于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在他们飞速消失中的农村往事中找到了新的兴趣。在这一时期，民间故事和舞蹈被收集起来，并且古典作曲家接受了农民的歌曲。物质和精神的福利意味着，至少可以暂时逃离城市去穷乡僻壤，并且存在一种流行在林中散步、游泳或其他户外休闲活动的时尚。美国人的荒野运动与此同时兴起，这种田园想象提供了另外一种趋向自然旅游的途径。

田园景观的观念——乏味的农村就像一种扩大的花园——变成全世界改良主义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像美国的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这样的景观建筑师，把田园景观作为一种平衡力提供给衰落的城市。例如，像中央公园或其他奥姆斯特德创造的景观，采用了田园般的新城市区的形式。奥姆斯特德是反城市和田园美学的伟大捍卫者，并仍在描绘大部分的美国郊区——弯曲的小径和轻柔的斜